

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恐怖,黑幕下一个被毁灭者,露出狰狞的面目,爆发“热血”的吼声……

本文要说的“夜半歌声”,温润、可爱且动听,也非出自“戏院顶楼”。延安西路64号“大理石宫”,曾经的“夜半歌声”,绵长悠远。

万马齐喑的十年之初,连小鸟也悄无声息。绍兴路上一家出版机构,决定编一本不定期的儿童歌刊。决策者是室主任任大霖,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汪玲,一个儿童文学家,一位儿童音乐家,互为知音,上下呼应。文化荒漠响起了布谷鸟的欢鸣。

汪玲是当时这个出版机构唯一的音乐编辑。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幼儿歌曲《打电话》《李小多分果果》《小燕子》等都是她的旋

律。今年,九十有三,上月刚谱就新作《唱着唱着长大了》。儿童音乐家永远不老。

汪玲接受大霖交办的任务以后,把散落在城乡的专业、业余作者集合起来。每周四晚上,大家像上班一样,准时赶到延安西路64号“大理石宫”,也

即现在的延安西路,建造了这座欧洲风格的公馆,内饰豪华,外观纯白。墙面与地面,由意大利进口大理石铺就,“大理石宫”因此得名。变身少年宫,是宋庆龄的选择。1952年,她访问苏联回来,决意创办中福会少年宫。在征得落户香港的嘉道理家属同意,中国第一个少年宫正式落成。

“大理石宫”现在是“金色摇篮”。主楼中庭直升屋顶,通透、敞亮,犹见苍穹。左右副楼皆两层。这个编外儿歌编辑部,每周四夜间的活动,就在右楼二层203室。我小心翼翼拾级而上,耳畔似有宋妈妈热切的声音:“有些事情是可以等待的,但是少年儿童培养,是不可以等待的。儿童是我们的未来,是我们的希望,我们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予儿童。”聚集在这里的儿童音乐工作者,日以继夜,正是为了不辜负宋妈妈的嘱托,要把最好的歌儿献给孩子。

中福会少年宫是全国儿童音乐的高地。脍炙人口的《梦见毛主席》《学习解放军》等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,就出自宫主任戴辉与几位艺术指导之手。他们还承担全市少儿合唱的普及与提高。每周四下午,上海少儿合唱的四大指挥家吴克辛、吴国钧、李金声与程金元,就在“大理石宫”切磋艺术。汪玲把歌刊编选活动的时间,安排在周四晚上,是想争取指挥的加入,为作品的鉴别与选择,提供一个易于演唱的保证。

周四晚上的活动内容,主要是讨论编创员新作,从各地来稿中优选佳作,其形式就是集体哼

唱,一边议,一边唱,边唱边议,边唱边改。“大理石宫”的“夜半歌声”,一阵接一阵。窗外大草坪上的花儿,随歌声轻舞,星空下的夜晚顿时生动起来。

考虑到传达室工作人员休息,每周四晚上的讨论,一般到十点半结束。由于来稿太多,常要挪到少年宫门外继续。延安西路的路灯下,十来个人,以汪玲为中心围成一个圈。“夜半歌声”随风飘荡,稀落的行人驻足观望,投以疑惑的目光,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。

那时,十点半之后,公交车全部停运,根本没有出租车。午夜之后讨论结束,一大半人骑自行车踏上归途,汪玲自备一辆“坦克克”,小一半人步行回家,个别家住郊区,过江轮渡一小时一班,回家已是凌晨。然而,他们乐此不疲。

所有的创作与编选工作,没有一分稿费,也没有任何津贴。集合时间是六点半,很多朋友下班,来不及吃饭,只能随带单位食堂的几个淡馒头。有朋友会带几只苹果,细心的朋友还会带一把“小洋刀”,切片分发。大家自我投喂,自我滋养。要把希望投送未来的一腔“热血”,让延安西路上的“夜半歌

声”,飞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北京出了一本《战地新歌》第一集。十一首儿童歌曲中,有流传至今的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《火车向着韶山跑》《针线包是传家宝》《小小螺丝帽》《革命故事会》《大家来做广播操》《小小球儿闪银光》等八首作品,全部出自延安西路上的“夜半歌声”,作者八成是这个编辑部的成员。我作词的那首《我是公社社员》,也忝列其中。

延安西路上的“夜半歌声”不仅出作品,还出人。玻璃厂女工金月琴,当上了中国唱片公司编辑,化工厂职工孙愚做了报社副刊编辑,幼教工作者友珊走进了电台少年部;徐以中老师调到音协工作;蒋为民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,狄其安被聘为上海歌剧院专业作曲。当年的热血青年,成为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新鲜血液。

我在市少年宫这个“摇篮”学习近四年,与少年宫领导及这些音乐家结为好友。1982年夏季的一天,我接到戴辉电话,说有事要帮忙。华东师大中文系有个毕业生,被分配到海港报当记者。她颇有文学天赋,《儿童时代》社想要她,希望港务局领导“放”了她。那时,戴辉已调离少年宫,到《儿童时代》社当领导;我在上海港一个公司工作。

我专程去了海关大楼,向干部处领导转达了戴辉的诉求。港务局领导爱才、惜才,把这位大学生的档案转送到《儿童时代》社。这位毕业生,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大作家陈丹燕。

找不出人生之目的,人生即没有价值,就不值得生。我现在的意义以为,人生虽是人之举措施——人为——所构成的,而人生之全体,却是天然界的一件事情。犹之演戏,虽其中所演者都是假的,而演戏之全体,却是真的——真是人生之一件事。人生之全体,既是天然界之一件事情,我们即不能说它有什么目的;犹之乎我们不能说山有什么目的,雨有什么目的。目的和手段,乃是为人人为之世界之用语,不能用于天然的世界——另一个世界。”

“亚里士多德说:‘天地生草,乃为畜牲预备食物;生畜牲,乃为人预备食物或器具。’”(见所著《政治学》)不过,我们于此,实在有点怀疑。有人嘲笑其目的论的哲学家说:“如果什么事都有目的,人所以生鼻,岂不也可以说是为架眼镜么?”一个很复杂、很难说清的哲学问题,冯友兰的回答,非常质朴,非常实在,非常巧妙,又非常睿智。对任何人都要面对的所谓“人生抉择”,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焦虑不安,反而充满了不慌不忙的自在感、钝感力,令人如被醍醐灌顶,豁然开朗。

我手头的那本《一种人生观》,为商务印书馆1929年10月初版,属“万有文库·第一集一千种”。至于什么时间的手,仿佛本文开头那句话是谁说的,我也早忘了。不过,买来时的价格倒是标得一清二楚:人民币0.5元。

忘了谁说的,那句话是:“冯友兰只是哲学老师,贺麟才是哲学家。”

我琢磨一番这句话的含义——冯友兰教哲学,当行出色,但要给他一个哲学家的头衔,勉强了;换言之,冯友兰在哲学思辨上缺少建树,够不上哲学家的称号。

我不了解哲学究竟为何物,只好去抄辞书里的定义——哲学源于古希腊语“爱智慧”,其核心是对人类存在、思维、价值等根本问题的系统性探究。它不同于具体科学对现象的解释,而是通过形而上学、认识论、伦理学等分支,追问“我是谁”“何为真理”“如何生活”等终极问题。

按照上述概念,冯友兰抗战期间写的《贞元六书》(《新理学》《新事论》《新世训》《新原人》《新天道》《新知言》)中,难道找不出一丁点他在哲学上的感悟?退一步说,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《中国哲学简史》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,虽然戴着一顶“史”的帽子,难道字里行间找不出一丁点他在哲学上的思考?

不可能吧。否则,如何理解韩国总统朴槿惠的那句话:“自与《中国哲学史》相遇,我恢复了心里的宁静,明白了之前所不能理解的许多事情。所谓人生,并不是与他人的斗争,而是与自己的斗争。”(《遇见我人生的灯塔——东方哲学》)

人们尽可认为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不够系统、不够深刻、不够新颖、不够独到,甚至在形而上的思辨上比不上贺麟,不过,在数量有限的中

唱,一边议,一边唱,边唱边议,边唱边改。“大理石宫”的“夜半歌声”,一阵接一阵。窗外大草坪上的花儿,随歌声轻舞,星空下的夜晚顿时生动起来。

考虑到传达室工作人员休息,每周四晚上的讨论,一般到十点半结束。由于来稿太多,常要挪到少年宫门外继续。延安西路的路灯下,十来个人,以汪玲为中心围成一个圈。“夜半歌声”随风飘荡,稀落的行人驻足观望,投以疑惑的目光,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。

那时,十点半之后,公交车全部停运,根本没有出租车。午夜之后讨论结束,一大半人骑自行车踏上归途,汪玲自备一辆“坦克克”,小一半人步行回家,个别家住郊区,过江轮渡一小时一班,回家已是凌晨。然而,他们乐此不疲。

所有的创作与编选工作,没有一分稿费,也没有任何津贴。集合时间是六点半,很多朋友下班,来不及吃饭,只能随带单位食堂的几个淡馒头。有朋友会带几只苹果,细心的朋友还会带一把“小洋刀”,切片分发。大家自我投喂,自我滋养。要把希望投送未来的一腔“热血”,让延安西路上的“夜半歌

声”,飞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北京出了一本《战地新歌》第一集。十一首儿童歌曲中,有流传至今的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《火车向着韶山跑》《针线包是传家宝》《小小螺丝帽》《革命故事会》《大家来做广播操》《小小球儿闪银光》等八首作品,全部出自延安西路上的“夜半歌声”,作者八成是这个编辑部的成员。我作词的那首《我是公社社员》,也忝列其中。

延安西路上的“夜半歌声”不仅出作品,还出人。玻璃厂女工金月琴,当上了中国唱片公司编辑,化工厂职工孙愚做了报社副刊编辑,幼教工作者友珊走进了电台少年部;徐以中老师调到音协工作;蒋为民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,狄其安被聘为上海歌剧院专业作曲。当年的热血青年,成为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新鲜血液。

我在市少年宫这个“摇篮”学习近四年,与少年宫领导及这些音乐家结为好友。1982年夏季的一天,我接到戴辉电话,说有事要帮忙。华东师大中文系有个毕业生,被分配到海港报当记者。她颇有文学天赋,《儿童时代》社想要她,希望港务局领导“放”了她。那时,戴辉已调离少年宫,到《儿童时代》社当领导;我在上海港一个公司工作。

我专程去了海关大楼,向干部处领导转达了戴辉的诉求。港务局领导爱才、惜才,把这位大学生的档案转送到《儿童时代》社。这位毕业生,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大作家陈丹燕。

找不出人生之目的,人生即没有价值,就不值得生。我现在的意义以为,人生虽是人之举措施——人为——所构成的,而人生之全体,却是天然界的一件事情。犹之演戏,虽其中所演者都是假的,而演戏之全体,却是真的——真是人生之一件事。人生之全体,既是天然界之一件事情,我们即不能说它有什么目的;犹之乎我们不能说山有什么目的,雨有什么目的。目的和手段,乃是为人人为之世界之用语,不能用于天然的世界——另一个世界。”

“亚里士多德说:‘天地生草,乃为畜牲预备食物;生畜牲,乃为人预备食物或器具。’”(见所著《政治学》)不过,我们于此,实在有点怀疑。有人嘲笑其目的论的哲学家说:“如果什么事都有目的,人所以生鼻,岂不也可以说是为架眼镜么?”一个很复杂、很难说清的哲学问题,冯友兰的回答,非常质朴,非常实在,非常巧妙,又非常睿智。对任何人都要面对的所谓“人生抉择”,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焦虑不安,反而充满了不慌不忙的自在感、钝感力,令人如被醍醐灌顶,豁然开朗。

我手头的那本《一种人生观》,为商务印书馆1929年10月初版,属“万有文库·第一集一千种”。至于什么时间的手,仿佛本文开头那句话是谁说的,我也早忘了。不过,买来时的价格倒是标得一清二楚:人民币0.5元。

找不出人生之目的,人生即没有价值,就不值得生。我现在的意义以为,人生虽是人之举措施——人为——所构成的,而人生之全体,却是天然界的一件事情。犹之演戏,虽其中所演者都是假的,而演戏之全体,却是真的——真是人生之一件事。人生之全体,既是天然界之一件事情,我们即不能说它有什么目的;犹之乎我们不能说山有什么目的,雨有什么目的。目的和手段,乃是为人人为之世界之用语,不能用于天然的世界——另一个世界。”

“亚里士多德说:‘天地生草,乃为畜牲预备食物;生畜牲,乃为人预备食物或器具。’”(见所著《政治学》)不过,我们于此,实在有点怀疑。有人嘲笑其目的论的哲学家说:“如果什么事都有目的,人所以生鼻,岂不也可以说是为架眼镜么?”一个很复杂、很难说清的哲学问题,冯友兰的回答,非常质朴,非常实在,非常巧妙,又非常睿智。对任何人都要面对的所谓“人生抉择”,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焦虑不安,反而充满了不慌不忙的自在感、钝感力,令人如被醍醐灌顶,豁然开朗。

我手头的那本《一种人生观》,为商务印书馆1929年10月初版,属“万有文库·第一集一千种”。至于什么时间的手,仿佛本文开头那句话是谁说的,我也早忘了。不过,买来时的价格倒是标得一清二楚:人民币0.5元。

找不出人生之目的,人生即没有价值,就不值得生。我现在的意义以为,人生虽是人之举措施——人为——所构成的,而人生之全体,却是天然界的一件事情。犹之演戏,虽其中所演者都是假的,而演戏之全体,却是真的——真是人生之一件事。人生之全体,既是天然界之一件事情,我们即不能说它有什么目的;犹之乎我们不能说山有什么目的,雨有什么目的。目的和手段,乃是为人人为之世界之用语,不能用于天然的世界——另一个世界。”

“亚里士多德说:‘天地生草,乃为畜牲预备食物;生畜牲,乃为人预备食物或器具。’”(见所著《政治学》)不过,我们于此,实在有点怀疑。有人嘲笑其目的论的哲学家说:“如果什么事都有目的,人所以生鼻,岂不也可以说是为架眼镜么?”一个很复杂、很难说清的哲学问题,冯友兰的回答,非常质朴,非常实在,非常巧妙,又非常睿智。对任何人都要面对的所谓“人生抉择”,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焦虑不安,反而充满了不慌不忙的自在感、钝感力,令人如被醍醐灌顶,豁然开朗。

我手头的那本《一种人生观》,为商务印书馆1929年10月初版,属“万有文库·第一集一千种”。至于什么时间的手,仿佛本文开头那句话是谁说的,我也早忘了。不过,买来时的价格倒是标得一清二楚:人民币0.5元。

找不出人生之目的,人生即没有价值,就不值得生。我现在的意义以为,人生虽是人之举措施——人为——所构成的,而人生之全体,却是天然界的一件事情。犹之演戏,虽其中所演者都是假的,而演戏之全体,却是真的——真是人生之一件事。人生之全体,既是天然界之一件事情,我们即不能说它有什么目的;犹之乎我们不能说山有什么目的,雨有什么目的。目的和手段,乃是为人人为之世界之用语,不能用于天然的世界——另一个世界。”

“亚里士多德说:‘天地生草,乃为畜牲预备食物;生畜牲,乃为人预备食物或器具。’”(见所著《政治学》)不过,我们于此,实在有点怀疑。有人嘲笑其目的论的哲学家说:“如果什么事都有目的,人所以生鼻,岂不也可以说是为架眼镜么?”一个很复杂、很难说清的哲学问题,冯友兰的回答,非常质朴,非常实在,非常巧妙,又非常睿智。对任何人都要面对的所谓“人生抉择”,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焦虑不安,反而充满了不慌不忙的自在感、钝感力,令人如被醍醐灌顶,豁然开朗。

我手头的那本《一种人生观》,为商务印书馆1929年10月初版,属“万有文库·第一集一千种”。至于什么时间的手,仿佛本文开头那句话是谁说的,我也早忘了。不过,买来时的价格倒是标得一清二楚:人民币0.5元。

找不出人生之目的,人生即没有价值,就不值得生。我现在的意义以为,人生虽是人之举措施——人为——所构成的,而人生之全体,却是天然界的一件事情。犹之演戏,虽其中所演者都是假的,而演戏之全体,却是真的——真是人生之一件事。人生之全体,既是天然界之一件事情,我们即不能说它有什么目的;犹之乎我们不能说山有什么目的,雨有什么目的。目的和手段,乃是为人人为之世界之用语,不能用于天然的世界——另一个世界。”

“亚里士多德说:‘天地生草,乃为畜牲预备食物;生畜牲,乃为人预备食物或器具。’”(见所著《政治学》)不过,我们于此,实在有点怀疑。有人嘲笑其目的论的哲学家说:“如果什么事都有目的,人所以生鼻,岂不也可以说是为架眼镜么?”一个很复杂、很难说清的哲学问题,冯友兰的回答,非常质朴,非常实在,非常巧妙,又非常睿智。对任何人都要面对的所谓“人生抉择”,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焦虑不安,反而充满了不慌不忙的自在感、钝感力,令人如被醍醐灌顶,豁然开朗。

我手头的那本《一种人生观》,为商务印书馆1929年10月初版,属“万有文库·第一集一千种”。至于什么时间的手,仿佛本文开头那句话是谁说的,我也早忘了。不过,买来时的价格倒是标得一清二楚:人民币0.5元。

我手头的那本《一种人生观》,为